



民国歌词中的契约精神

——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与审美现代性研究之一

■陈 伟 李红梅

契约精神是现代性的体现,是个体自由的基础,是现代公民审美价值取向的映射。随着时代的发展,契约已经由单纯的社会学和法学语词发展成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特殊概念。在契约精神的美学观照下,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呈现出独特的美学意蕴,成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音乐样式之一。本文从民国歌词中契约精神的主要表现入手,分析这一现象的民族渊源和现代内涵,并阐释其美学现代性的价值与当下意义。

[关键词] 民国歌词; 早期都市流行歌曲; 契约精神;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1)05-0178-09

陈 伟(1957—),男,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文艺学;李红梅(1983—),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上海 200234)

本文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与都市文化”(2009JJD840013)、上海市教委重点创新项目“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与美学现代性研究”(2011年)阶段性成果。

早期都市流行歌曲^①是民国时期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的艺术样式。这些歌曲的歌词中蕴涵的契约精神是早期都市流行歌曲所蕴含的审美现代性的重要内容。民国歌词中的契约精神不仅体现了以宏大叙事为主要特征的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要求,还体现了个体解放与个性自由的情感诉求,反映了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时代性与进步性。“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旗帜,为20世纪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过对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学者的著作的译介和研究,社会契约理论在中国得到发展。^②作为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契约精神自然成为新生艺术的审美价值取向。从广义上讲,契约可以定义为双方在法律基础上

订立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这种协议包含了自由平等、权责对等、利益本位、诚实守信等现代核心价值理念。卢梭认为:“社会契约不是惩治邪恶的工具,而是人们获得真正自由与理性、实现意义的途径。”^{[1](P5)}随着历史的发展,契约已经从一个社会学和法学语词,发展成一个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内涵的特殊概念。民国歌词中的契约精神,倡导了一种平等、尚法、守信的社会行为准则,反映了社会组织方式的合理性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性,是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审美现代性的重要体现。

一、民国歌词中契约精神的主要表现

契约精神在民国歌词中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都市文化背景下的自由平等观

自由与平等是契约精神的核心内容。民国歌词中涌现了大量反映自由平等观念的优秀作品,是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对时代精神的重要阐释。都市文化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社会生产方面,也体现在文化生产与消费方面。都市文化的大背景为当时大众的交往搭建了一个公开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之上,人与人之间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

首先,这种契约精神体现在对国家主权思想的诉求上。从国家政权的角度讲,国与国之间也要遵循独立、自主、平等的基本原则。卢梭认为,国家的行为“并不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一种约定,而是共同体和它的各个成员之间的一种约定,它是合法的约定,因为它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它是公平的约定,因为它对一切人都是共同的;它是有益的约定,因为它除了公共的幸福而外就不能再有任何别的目的;它是稳固的约定,因为它有着公共的力量和最高权力作为保障”^[1](P40)]。20世纪早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漫长斗争,争取民族独立、个体自由的审美取向也反映到流行歌曲中。如1937年影片《夜半歌声》插曲,由冼星海作曲、田汉作词、金山演唱的《热血》:

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
人道的烽火,传遍了整个的欧洲。
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
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
我们的热血,第聂伯尔河似的奔流!
任敌人的毒焰,胜过科利色姆当年的猛兽。
但胜利终是我们的,我们没有怨尤。
瞧吧,黑暗快要到了。
光明已经射到古罗马的城头,古罗马的城头。

《热血》歌词感情真挚,曲调铿锵有力,节奏鲜明,反映了为国家主权独立、民族自由而战的革

命激情。类似题材的流行歌曲还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军进行曲》、《凯旋歌》等等。

其次,契约精神还体现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方面。早期流行歌曲的自由平等观是建立在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封建社会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压迫是毋庸置疑的。“早期流行歌曲对于女性觉醒意识的书写,首先即从思想上对由于性别歧视而带来的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障碍进行了清理,并宣扬新女性作为‘人之子’无需再屈从与附属,要积极争取作为‘社会人’的不可剥夺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2]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女性不再承认男权的特殊地位,勇敢地站出来展示自我价值,争取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以《上海小姐》为例:

上海是东方的都会 上海小姐多娇媚
思想前进 身体健美 勇敢活泼双智慧

愿你们努力改造这新时代
为女性们争取荣誉的光辉

上海是东方的都会 上海小姐多娇媚

类似歌曲还有周璇演唱的《女人》、《天涯歌女》、《四季歌》,以及由聂耳作曲、陈燕燕和黎莉莉演唱的《新的女性》等等,这些作品都反映了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认定,进而提出了作为社会中平等的人格身份的权力诉求,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正如李欧梵论述的那样:“上海城市生活中舞厅的流行,其实反而给新女性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背景……在中国传统文学中选择这组女性形象,把她们‘现代化’为城市物质文明的载体,因此她们一个个显得活力四射,对她们自身的‘主体性’也反而更有信心,甚而还与男人周旋,在舞厅、咖啡馆、跑马场这样的公共休闲场所耍弄男人。”^[3]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对封建社会男权制度的反抗与颠覆,是对平等自由、权责对等、利益共享等主体意识的具体阐释。

再次,都市人对自身地位平等、交往自由的

人本主义追求。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中涌现了大量描写都市人生活喜怒哀乐的作品,反映了都市个体要求地位平等、向往自由的审美诉求。如陈歌辛根据自身情感经历所谱的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最娇美 玫瑰玫瑰最艳丽。
长夏开在枝头上 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情意重 玫瑰玫瑰情意浓。
长夏开在荆棘里 玫瑰玫瑰我爱你
心的誓约,心的情意,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心的誓约,心的情意,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玫瑰玫瑰枝儿细 玫瑰玫瑰刺儿锐。
今朝风雨来摧残,伤了嫩枝和姣蕊。
玫瑰玫瑰心儿尖 玫瑰玫瑰刺儿尖。

来日风雨来摧残,毁不了并蒂枝连理。

歌曲描述了主人公以一介布衣身份追求富家千金并最后良偶佳成的故事,表现了年轻人突破门第观念,大胆追求民主平等、交往自由的婚恋观。这也是我国第一首被翻译成英文而传遍世界的流行歌曲,1951年曾荣登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榜首。热情奔放的歌词、灵活多变的曲调,加上“金嗓子”周璇温柔甜美的嗓音,使这首歌曲至今听来都令人回味无穷。

又如《卖饼儿》:

北风吹来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

百业无高卑,志当坚,青年有求,怎能偷生于世间。

都市生活的最大不同在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远离了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生活,进入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都市,以商品交易为生的市民体会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大量反映这种生活的流行歌曲作品表达了他们的心声。20世纪早期的中国都市虽然人气愈聚,百业渐盛,但仍存在着大量饱受生活困苦的底层百姓。这首

《卖饼儿》描写的就是都市贫苦众生,虽感生活艰辛,但仍向往和追求平等自由生活的坚忍意志。歌曲《博爱》号召人人都以博爱为交换条件,共同建立一个相亲相敬、助人为乐的大同社会。类似歌曲还有《卖油条》、《卖汤圆》等。像“百业无高卑,志当坚,青年有求,怎能偷生于世间”、“公平交易可以包退包换”等歌词,体现了“五四”以后中国人审美价值取向的真正内涵,这种信守承诺并不辞劳苦地勇于承担义务的契约精神,让人备受鼓舞和感动。

(二)现代经济依托下的要约观

从契约制定的角度讲,要约是一种具体明确的、希望他人与自己订立契约的意思表示。这种立意是建立在权责相等的基础之上的。20世纪上半期,随着民族资本的增长,产业工人的数量迅速增多。以产业工人作为主要成员的都市社会群体,在价值观上与前人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审美意识形态的改变来源于生产方式的改变,又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现状。经济的独立是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工人的经济独立使物主对自己的所有物有了自由的支配权,从而为自由公平的交往提供了前提。中国第一首都市流行歌曲,由黎锦辉作词作曲,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便反映了这样的现状:

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
微风细雨柳青青,哎哟哟柳青青。

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

奴奴呀,只要你的心,哎哟哟,你的心!

毛毛雨不要尽为难,微微风不要尽麻烦,

雨打风吹行路难,哎哟哟行路难。

年轻的郎,太阳刚出山,

年轻的姐,荷花刚展瓣,

莫等花残日落山,哎哟哟,日落山!

又如电影《梦里乾坤》插曲,由许如辉作词作曲,谈瑛、孙敏合唱的《美丽小家庭》:

(女) 美丽的小家庭 两个人的一条心
不愁吃 不愁穿 有的是爱情 美丽的小家庭
(男) 你不嫌我穷 分外更相亲 曼丽 曼丽 伟大的女性 拚了我的肝和心
能不能报答你的恩和情 (女) 说什么恩情 (男) 拜倒石榴裙 (女) 光裕 光裕
可爱的男性 你我白头同偕老 但愿你永远不变这样的心 美丽的小家庭 两个人
的一条心 不愁吃 不愁穿 有的是爱情 美丽的小家庭 (男) 你我白头同偕老
(女) 但愿你永远不变这样的心 (合) 美丽的小家庭 两个人的一条心 不愁吃 不
愁穿 有的是爱情 美丽的小家庭

30年代的上海,工厂林立,大量产业工人的需求使得年轻女性从农村涌入城市。她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而获得经济收入,逐渐取得平等的政治地位和应有的话语权,从而能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权力要求。如同《毛毛雨》中表现的那样,这种“不要金银只要心”的情感诉求,就是建立在这种平等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首歌曲还突出地表现了对契约成立的信心方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大胆追求爱情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歌曲采用民间小调的旋律,加上西洋弦乐配器,风格新颖,情感真挚,客观地反映了女主人公反抗封建束缚,大胆追求爱情的情感诉求。《美丽的小家庭》中的女主人公曼丽,不贪图荣华富贵,只求白头偕老,永不变心;男主人公则感激于对方的倾慕,愿意“拚了我的肝和心”地报答曼丽的爱情,表达了愿意与之建立家庭、共赴锦绣前程的美好愿望。这些情感诉求都只有在现代公平、开放的经济环境下才能真正实现。类似歌曲还有《天涯歌女》、《卖杂货》等,都表现了这种要约精神。封建社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坚不可摧的。然而歌曲《教我如何能嫁他》却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成为早期流行歌曲中行使要约权力的少有典范。女主人公在向母亲罗列了对方的种种不

足之后,最终确立了“教我如何能嫁他”的主基调,言辞恳切,据理力争,曲调虽欲商榷但又不乏激昂之情,体现了以现代经济为依托的要约观念。

(三) 公平互助基础上的交换观

虽然契约精神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利益,但它在保证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产生利他的效果。契约的形成应符合缔约双方的基本意向,即契约是在合意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人际关系。它表明关系双方在规则、约定、条件诸方面达成共识,具有合理利己主义的宗旨和内涵。此外,由于契约的缔结方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也就是说,契约的缔结打破了社会个体的自我封闭状态,是一种交际手段。在这样一个宽松、公平、合理的环境里,契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互利互惠的最终目的。在以工商业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社会中,这种公平互助是通过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实现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经济往来、财产流转都不是通过行政权力或某个权力部门的硬性分配,而是通过以契约为媒介的市场交易进行的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市场关系,维系着市场主体之间的联系,以及市场主体与市场的关系,而契约作为联结市场主体的纽带和市场关系的法律表现,它的作用机制与市场机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4] (P100)}在契约精神的观照下,社会是一个大市场,每个人都是市场的主体,共同营造一个融洽而自由的交换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市场主体之间各尽其能,各取所需,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共赢的最终目的。这种公平合理的对等交易远远超出商品的范围,还包括情感、意志、趣味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周璇演唱的歌曲《交换》:

月儿照在花上 人儿坐在花树旁
你教我书 你教我画
我报答你的是歌唱

作书作画是你强 唱起歌来我嘹亮
 你的书画 我的歌唱
 这样的交换可相当
 这样的交换 大家不冤枉
 又如都杰、周萍合唱的歌曲《洗菜心》
 姐在河边洗菜心 郎在对面采红菱
 采了红菱上街口 丢只红菱姐尝新 多谢
 哥哥好片心 红菱给我先尝新 吃了你红
 菱要还敬 送你一块花手巾 多谢姐姐好
 片心 送我一块花手巾 受了你手巾要还
 敬 送你丝线做花枕 多谢哥哥好片心
 送我丝线做花枕 受了你丝线要还敬, 做
 双花鞋送郎君 多谢姐姐好片心 送我花
 鞋送我行 穿了你花鞋要还敬 送你金钗
 钱八分 戴了你金钗要还敬 青纱帐内报
 你恩 说报恩来话报恩 去年八月到如今
 宜兴茶壶出张嘴 蛀空杨柳不苞青

对于缔结双方来讲,这种交换带来的实惠是巨大的。“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渡让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1](P20)}与一般意义的交换不同,这种建立在公平互助基础上的交换原则带来的收益往往会大于缔约方利益的简单叠加。《交换》中“你教我书画,我报答你的是歌唱”,歌词简易大方,曲调明朗欢快,听众能从中感受到这种“交易”给双方带来的轻松与喜悦。双方在心理上取得了平衡,从而可以在更加自由、开放的氛围中更加合理地交往。《洗菜心》中礼尚往来,双方之间从不亏欠,权责对等,利益均分,二人在这样一个你来我往的过程中逐渐情深意笃,留传一段佳话。又如由梁萍、严华合唱的《山歌情侣》中“二人互助精神好,努力前程最要紧”的情感表达,类似歌曲都表现了公平互助基础上的交换观。

二、民国歌词中契约精神的民族渊源与现代内涵

民国歌词中所体现的契约精神,是在上海自由开放的环境下,中西文化沟通碰撞的结果。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审美现代性即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的。这种审美现代性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西方法治观念的追求,还反映了本民族文化的传统特点。中国古代儒家伦理中的道德观念通过诚信原则实现了现代转换,近代西方民法通则中的法治观念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了发扬。

(一)中国古代儒家伦理的现代转换

诚信原则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与现代契约精神内涵的共同因素。但由于价值观念方面的因素,二者的诚信观在精神理念上存在着很大不同。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5](P11)}意思是用道德的力量感化人民,就能形成巨大的向心力,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音乐在中国古代社会一向是作为礼的附庸身份而出现的,是儒家伦理观念的传声筒。所以,在封建传统文化遭遇最激烈撞击的20世纪20年代,儒家伦理与现代性的冲突在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中得到了最突出的体现。“五四”时期,激进的批评家们指出,封建文化是以儒家宗法为本位的伦理文化。所以,要反对封建传统、封建文化,首先要从反对宗法伦理中的道德观念开始,这种道德观念即对宗法伦理的诚信原则。上述流行歌曲中的自由平等、权责对等、利益共享等契约理念是通过诚信原则体现出来的。无论是作为国家的一员,还是社会的一员,都要有信守承诺的契约精神。有所不同的是,“五四”之前人们诚信的对象是儒家宗法伦理制度。“五四”之后,“自由”、“民主”、“科学”等口号的提出直接引起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不再忠信于伦理宗法,而转向了散发着理性光辉的契约理念。

中国古代主要是以儒家宗法观念为伦理制

度的国家,以宗法伦理为道德对象的诚信原则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儒家思想以伦理问题为核心,着重于对人的伦理特性的研究,把人看作从群体需要出发、维护社会群体生存的伦理主体,要求人人都致力于道德人格的完善,以便维持一种以道德理性为原则、用道德关系作为调节杠杆的稳定的社会秩序。”^{[6](P64)}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人都不是独立的存在,都处于“三纲五常”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诚信原则也是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严格遵守。义务的履行靠的是对统治者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的皈依。这种关系的维系是单方面的,不仅衍生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还会引起特权意识。诚信本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关键是诚信的对象是特权意识的产物。这种只讲权力不讲义务的特权主体是感性、多变的,滥用职权以满足私利的现象便不可避免。同样,从履行职责的角度讲,义务方的德性自我慰藉也容易造成对义务的曲解而使自身逃避责任。随之而来的是这种社会组织法带来的人际关系的不平衡,最终模糊了权责界限,导致了猜忌与幽怨,其结果也破坏了诚信原则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

以儒家伦理为本位的道德原则转向以契约理念为本位的诚信原则,反映了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现代意识。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中蕴涵的自由平等、权责对等、利益共享等精神理念,是诚信原则在现代社会中的体现,也是契约精神的具体折射。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告诫广大青年要“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无以奴自处之义务”。从整体思维的角度上讲,“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契约”代替“伦理”的文化运动。随着近代传统社会结构的逐渐松动,具有现代价值内涵的诚信原则作为契约精神的核心价值理念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在都市文化这样一个开放的大背景下,人们不再唯封建宗法伦理观念是从,而是将诚信的对象转向了尊崇个人意志的契约理念。这种诚

信是针对所有缔约方的,即任何一个缔约方不同意都不会达成契约。在契约理念的观照下,像《玫瑰玫瑰我爱你》、《蔷薇处处开》、《上海小姐》崇尚的是个体的平等与自由;《毛毛雨》、《美丽小家庭》推崇的是个体的独立;《交换》、《洗菜心》注重的是缔约方权利与责任的对等。这些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诚信对象选择上的巨大变化。在这种转换的过程中,侧重于将一方的道德良知转换成双方的责权关系,诚信原则没有被丢弃,随着对象的转换,其内涵反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二)西方近代民法通则的吸收应用

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释法学派将此引申为“契约即法律”,这一观念在其后相继独立或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的国家立法中得到了强化,并逐渐形成了以契约为核心的法治文明。社会契约理论属于资本主义文化范畴,反映的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法治要求。法治不同于德治,其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使法律在各种社会调整措施中具有强制性、至上性和权威性。随着西方启蒙学者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以契约为核心的法治文明观念深入人心。“以自由、民主、平等、天赋人权说为基础的契约文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开始传播的,由于近代中国当时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这种传播也不免受其深刻的影响,从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4](P272)}20世纪早期人们的法治观念是随着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展开而普及的。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中,自由、民主、平等、天赋人权等思想进入了当时人们的视野,人们的法治观念逐渐增强。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性审美诉求趋向于更合理、健全的社会良性运转方式。以法治文明为基本内容的契约理论充当了这个媒介,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法治价值反映到都市流行歌曲上,是对自由平等观、要

约观、交换观的具体运用。

真正的美应该“始终带有时代的特色,而又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反映着特定社会历史时期人的本质力量,体现着特定社会历史时期人的理想、人的追求、人的精神寄托和人的奋斗目标,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7](P384)}。在“民主”、“科学”等口号的影响下,契约法治思维作为一种启蒙精神而被宣传开来。契约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它基于缔约方的自由意志而建立,不存在对任何个人的单向服从与制约。然而在法治思维统摄下,契约一旦成立,便有了法律效力。有契约的人际交往便成了一种法治思维观照下的交往。从客观上讲,人们必须把自由平等、权责对等、利益共享等理念当作法律条文一样遵从。所以,像《热血》中的追求民族解放,《毛毛雨》中的自由要约,《交换》中的要求权责对等等精神理念,都是在法治理念的制约下进行的。而从主观上讲,契约的法治观念从根本上符合了人们的精神意志和利益追求。通过契约,缔结方不仅得到了明晰的权责规制,还能成为契约寻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保障,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体自由性,实现了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作为艺术品的普世价值。

民国歌词中的契约法治思想体现了一种法美学。与同为社会规则体系的德治相比,法治更有次序和条理,更为整齐,同时也更易于操作。法治的规则美既表现在自身具有严整的逻辑而实现圆满自洽方面,也表现在契约方之间的协调与相互配合方面。如黑格尔论述的那样:“符合规律固然还不是主体的完整的统一和自由,但是已经是一种本质上的差异面的整体,不是仅仅现为差异面和对立面,而是在它的整体上现出统一和互相依存的关系。”^{[8](P178)}法治的合理性在于对个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确认和保障,进而为实现和谐的美创造必要条件。如《上海小姐》中对女性体态、精神等方面的歌颂与尊重,《小小家庭》中对夫妻双方责权的明晰规定,

《洗菜心》中恋爱双方的公平交易的合理与公正,都实现了和谐之美。所以,以自由平等、权责对等、利益共享为价值理念的契约法治是在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美,实现美。这也是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上海大都市所提供的实践环境

任何一个社会的追求真理的观念,都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生活。这种观念是否合理,能否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契约精神在民国歌词中的体现,与上海大都市这样一个实践环境分不开。“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之兴起及其飞速发展,发生在19世纪中叶中国在西方列强压迫下被迫开放以后之短短数十年间。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成为中国人口最多、工业最为发达、对外交往最为密切、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际大都市,并可执东亚都市现代化之牛耳。”^{[9](P222)}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型大都市的开放性,使流行歌曲在创作之初便汲取了西方近代文明的营养。作为西方理性文明烛照之下的契约精神,很快便渗入到这样一个环境,成为当时最活跃的流行音乐创作的艺术选择。

流行歌曲是一种大众文化,其产生之初便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取胜。加之上海大都市作为传播媒介的作用,流行音乐得以迅速传播。从作品本身角度讲,这些流行歌曲主题丰富多变,内容通俗易懂,曲调灵活多样,非常适合在公共场合传唱。而从当时都市生活的文化需求讲,像《毛毛雨》、《玫瑰玫瑰我爱你》、《交换》等体现了自由平等、权责对等、利益共享等现代价值理念的流行歌曲,本身就富含了都市生活所熟知的商业交往原则,迎合了大上海市民的审美需求。所以,大上海的舞厅、咖啡馆、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十里洋场的繁华景象,都为这些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提供了实践环境。作为早期流行歌曲先驱者之一的许如辉,其女儿曾有这样的论述:“父亲随大同乐会造访过无数高级宾馆,如

哈同花园(祝寿会),大华饭店(蒋宋联姻),常与异国情调的爵士乐团擦臂而过,他感到新鲜、好奇、直想模仿。那时,上海戏馆影院已遍及大街小巷,要看戏,怎么也比嵊县乡下只有一出的‘笃板’斑斓、丰采得多了。而法、俄、犹太侨民音乐家在沪上开班、讲学、授徒、演出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整座城市散发出一种祥和、包容、现代、多元、独特的文化艺术气氛。”^[10]由范烟桥作词、陈枚作曲、周璇演唱的《夜上海》便反映了当时的现状。特别是电影对流行歌曲的传播作用,很多歌星大都以拍电影为主并在电影中演唱插曲,成为歌影双栖的明星。^{[11](P150)}

三、民国歌词中契约精神的当下意义与前车之鉴

民国歌词中的契约精神是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审美现代性的重要折射,它所包含的自由平等、权责对等、利益共享等现代价值理念,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和情感诉求。特别是对德治与法治观念的发展,对当下文化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早期都市流行歌曲距今已逾大半个世纪,但其中所包含的契约精神至今对我们当下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现代公民意识的呼唤

改革开放以来,以城镇化为核心的小康社会逐渐形成。与之相应的是建立在现代工商业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美学形态的呈现,其特征为“崇尚主体性,高扬主体权利,承认客体世界的无限性和人认识客体世界的局限性”^{[7](P346)}。所以,公民应该具有自由平等、权责对等、利益共享等主体意识,特别应该具有社会契约理论引导下的法治意识。“五四”以后公民意识发展的曲折历程也表明,契约文明及其所蕴涵的权责关系都应该成为公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加以强调。建立在权责关系基础之上的法治观念应该是小康社会公民意识的重要内容,因为“社会主义公民不仅必须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人,还必须是法意识充分发展的人。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可以缺乏各种知识,但唯有法意识不可或缺。法意识的缺乏,意味着尚不具备公民的条件,是政治幼稚人”^{[12](P65)}。当下社会中一些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与公民自身法治意识的缺乏也有一定的关系。现代公民应该贯彻自由、平等、民主的启蒙精神,用契约的法治理念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自觉寻求契约的保护和依赖。同时,作为缔约方,公民还应该具有合作和诚信意识,自觉遵守市民公约,主动地参与到和谐社会的建构中来。

(二)对构建先进文化的导引

民国歌词中的契约精神所传达的社会文明,已经成为我们悠久而开放的文明的一部分。契约的精神理念告诉我们,尊重个体利益并不意味着损人利己和以邻为壑。相反“中国伦理中的群体利益至上,为群体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的价值观,贻害了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助长了以公共利益名义损人利己,阻滞了社会整体繁荣”^{[13](P205)}。契约精神所包含的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人文精神和法治智慧,对构建先进文化有以下几点值得借鉴:第一,发扬契约理念中民主、平等、自由的启蒙精神,挖掘中国古代社会契约传统的合理成分,按照美的规律建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民族正气,实现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第二,将诚信原则纳入公民法治建设的视野,建构公平、合理的契约法制,使不同的伦理传统与文化资源既保持合理的空间与张力,又能实现同构与互益,达致社会和谐的根本目的。第三,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儒家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道统,也是吸收外来文化的根基。当下先进文化的建构,应该继续吸收西方像契约文明这样的合理理论,并结合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立足于整体文化的世界眼光与人类情怀,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美学智慧,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品格。

(三)对避免不良习俗的借鉴

契约文明是一种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文明,过度宣扬法治会使文化缺少人文关怀而流于形式。特别是借契约之名行私利之实,以玩弄文字游戏的方式使对方陷入利益受损地位的做法,都是违背契约精神本意的。避免类似不良习俗,一方面要做到儒家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要求,尊重缔约方的平等地位。立契意味着自由交易过程中当事人之间对财产和责任的确定和延伸,意味着通过自愿合作与自由竞争来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只有将对方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放在等同的地位,尊重契约整体,才能实现个人和缔约整体的最大利益。另一方面,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信守承诺。特别是对于那些无视契约条文,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不良行为,不仅要通过法制措施进行制止,还要通过道德自觉的良性原则进行诚信教化。只有将自由平等、权责对等、利益共享等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相结合,才能使这一蕴含了西方人文智慧的契约精神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本文所称“早期都市流行歌曲”,是指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盛行于20世纪30-40年代,以都市民众为受众,以商业运作为模式,以唱片、舞厅、电台、电影为渠道,以审美现代性为方向,以贯穿古今、融汇中西为创作理念的大众歌曲。这些歌曲,从内涵来看,大多蕴含着科学、民主、平等、爱国等思想情怀,是中国起始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绪和曲折反映。

②西方的社会契约概念(Contract)最早由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提出,在启蒙运动中,格劳秀斯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契约理论的首倡者,霍布斯是这一理论的奠

基者。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将这一理论体系化,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理论。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及两国的宪法均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思想。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社会契约观念的理解和应用,基本上是在这本著作基础之上的。

[参考文献]

- [1](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2]陈伟,李琼. 中国早期流行歌曲与女性书写[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6).
- [3]李欧梵. 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 上海:三联书店,2008.
- [4]蒋先福. 契约文明:法治文明的源与流[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5](春秋)孔子. 论语·为政篇第二[M]. 杨伯峻,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6]刘宗贤. 儒家伦理:秩序与活力[M]. 济南:齐鲁书社,2002.
- [7]陈伟. 文艺美学的理论与历史[M]. 上海:三联书店,2006.
- [8](德)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M].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9]汪朝光. 早期电影业与现代化的进程[A]. 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 [10]许文霞. 我的父亲许如辉与中国早期流行歌曲[J]. 音乐学研究,2002,(1).
- [11]解学初. 流行音乐文化教程[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 [12]蒋德海. 伦理文明,还是法治文明?[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3]李留澜. 契约时代——中国社会关系现代化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龙迪勇】